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1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王缉思　世界政治变迁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

约瑟夫·奈　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亚洲与美国

马凯硕　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

朱　锋　构建互敬、互谅与互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拉贾·莫汗　亚洲正在出现的中印美战略三角

张沱生　新形势下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若干思考

江忆恩　陈喜娜　中国崛起：对概念运用的探讨

世界知识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1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 / 王缉思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12-4071-5
Ⅰ.中… Ⅱ.王… Ⅲ.①国际形势—研究—2011 ②对外政策—研究—中国—2011 Ⅳ.①D5 ②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5402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田　林

书　　名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 Zhongguo Guoji Zhanlue Pinglun 2011
主　　编	王缉思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电　　话	010-65265919（直销）　010-65265923（发行）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25¾印张
字　　数	5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071-5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1（总第4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主　　编：王缉思
副 主 编：袁　明　　朱　锋　　于铁军
编　　辑：陈志瑞　　魏红霞　　卢　宁　　凌　岳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铁军　　王　勇　　王缉思　　王锁劳　　叶自成　　归泳涛
朱　锋　　关贵海　　余万里　　李安山　　张海滨　　查道炯
袁　明　　袁路明　　袁　鹏　　梅　然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政编码：100871
电　　话：010-62756530，010-62756844
传　　真：010-62759302
网　　址：http：//www.ciss.pku.edu.cn
电子信箱：CISS@pku.edu.cn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国家战略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中心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中心的成果形式包括不定期发表的《国际战略研究简报》、专题研究报告、每年一期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以及编辑出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社会问题日益相互交叉、相互激荡。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进入了国际战略的研究视野。本中心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

本中心于2007年5月正式成立，属北京大学领导，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管理。中心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由北京大学主管领导担任理事长，校内外资深学者专家担任理事。中心学术委员会具体组织研究工作和交流活动，负责课题的立项和审查。

本中心是开放型、非营利的学术机构，努力同国内外相关学术单位、思想库、实际工作部门和媒体进行交流与合作。研究经费自筹，欢迎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资助。

序

“国际战略”是一个古老的研究领域，又包含着崭新的研究内容。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金融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日益涉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切身利益。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短缺、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绝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我国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许多民间机构、学术团体也在献计献策。但是，任何一个具体部门、机构和个人，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所以需要总体规划和全局分析，凝聚共识，形成并落实中国的长远国际战略。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

承蒙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书得以顺畅出版，在此深表感激。我们计划将《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编写为每年出版一部的系列研究报告，既包括本领域的宏观评论展望，又包括对现实国际问题的微观分析探讨；既坚持以国内学者的论述为主体，又向海外学者的真知灼见敞开大门。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

王缉思

2008年初夏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　录

专题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亚洲和世界*

* **世界政治变迁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 1
王缉思

* **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亚洲与美国** 13
［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 **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 22
［新加坡］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 **构建互敬、互谅与互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32
朱　锋

* **亚洲正在出现的中印美战略三角** 41
［印］拉贾·莫汉（C. Raja Mohan）

* **从德国经验看中国的“全球性大国”之路** 52
［美］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N. Luttwak）

新形势下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若干思考 61
张沱生

中国崛起：对概念运用的探讨 70
[美]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美] 陈喜娜 (Sheena Chestnut)

争论中的世界秩序观与中国对外战略 88
杨 筱

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 99
袁 鹏

韩国李明博政府与中韩关系 108
[韩] 文正仁 [韩] 李春福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非关系发展 121
刘海方

澳大利亚对中国全球角色的认知 135
[澳] 罗德尼·蒂芬 (Rodney Tiffen)

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调整 145
杨伯江

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评析 154
[韩] 朱宰佑

"天安舰"事件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 166
孙 茹

崛起中的印度：自我角色认知与对外战略调整 176
张 力

俄罗斯能否与西方建立现代化联盟? 189
吴大辉

艰难的平叛之路：2010年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 200
钱雪梅

2010年缅甸大选对国家政治转型的影响 213
宋清润

2010年中亚局势述评 224
杨　恕

“阿拉伯之春”：回顾与展望 234
王锁劳

从卢拉到罗塞夫：巴西外交的特点与政策调整 245
吴国平

南非与津巴布韦政府的民族政策比较 256
李安山

试析沙特阿拉伯的对外战略 269
吴冰冰

试析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 279
昝　涛

金融危机以来大国军事战略调整 290
唐永胜　王钰

2010亚太安全环境：战略博弈、领土争端及发展趋势 300
孙建中

美欧关系、俄罗斯因素与北约战略转型的前景 311
徐弃郁

印度洋海权问题之细思考 321
师小芹

从新版《国家航天政策》看美国航天领域发展趋势 333
曾　东

新兴力量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343
王勇　刘玮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会危及欧洲一体化 358
范勇鹏

从中美关系史视角看中国海外粮食获取 369
查道炯

人口老龄化与国际安全战略 378
初晓波

新能源革命与战略制高点：美国的实践 394
胡菁菁

专题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亚洲和世界

世界政治变迁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1]

王缉思

2011年初北非中东出现的社会政治动荡，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揭开了21世纪下一个十年的序幕。姑且不论这几场动荡的性质和根源，单就形式而言，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国家依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但族群、教派、各类社会团体以至个人（尤其是掌握了网络通信工具的青年一代）都将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仍将是影响国际安全的关键因素，而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干预力度在加大，并呈现日益复杂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一大变量，成为中国思考和制定未来对外战略时不可或缺的考量。

近年来，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的迅速增长，不仅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成为它们制订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个因素，也同时对中国人观察国际事务的心态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手段产生了明显影响。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成为决策部门、思想库和相关学者在研讨中国对外战略调整时的另一重要考量。

基于此，本文的两个主要着眼点，一是世界政治变迁的特征和趋势，二是中国在当今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定位”问题。最后，本文将就中国的大战略选择略抒己见。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1 本文在以下几篇拙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1）王缉思、唐士其：“30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47期，2010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编印；（2）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3）王缉思：“中国大战略求索”，《东方早报》2011年2月28日—3月2日连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昊为本文的完成提供了极大帮助，作者在此深深致谢。

一、世界政治变迁的基本特征

当前中东变局的出现，既有偶发因素，也有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广阔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各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也日趋加深。相比起观察者相对熟悉的地域和国家特征来说，世界政治变迁的时代和阶段性特征更值得研究。

过去3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

过去3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那些已经采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本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公共社会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等）凸显，宗教与民族问题政治化，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都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重新定义着世界政治的内涵。总结30年来世界政治的变迁，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一个国家民主与自由的程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之一。个人独裁、家族统治、信息封闭、政府工作不透明、人权遭到践踏，在任何国情和政情下都很难加以辩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一直稳定，即使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或一般性社会危机，也没有对政治体制造成根本冲击。1970年代时，采用竞争性多党制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是少数，到1990年代后期已经占绝大多数。今天，即使像缅甸、伊朗这样一些被认为是独裁专制的国家，也在表面上维持着多党政治或普选制。从长远来看，非西方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过渡表现出某种不可逆转的势头。但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国家中尚未出现一个完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亚国家在短时间内从模仿西方民主回归到更为熟悉的强人政治，而保留着西方文化传统的中东欧国家却能很快适应多党民主。这说明：一方面，宗教、文化与政治传统对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程度同民主化出现的迟早没有必然联系，但同民主化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

第二，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异的诉求和特色。发达国家的传统民主制显出一些缺陷和弊端，比如少数人的权益在“竞争性多数决”制度下遭受牺牲，于是“共识民主”和“慎议民主”应运而生。西方国家

也在选举制度、议会制、中央政府同地方的分权、公众舆论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进行种种改革。冷战结束后，广大非西方国家得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美国使用武力“解放”伊拉克和阿富汗、强行推动当地“民主化”的情况，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也有西方势力挑动的背景，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要求的。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政治对立，等等，并不能否定民主本身的价值和各国“试错”努力的意义。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民主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要求的。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民主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第三，在公民自由和民主制度之外，稳定与秩序也是各国政治所追求的目标。经验证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小群体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还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个人私欲极度膨胀的恶果。在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上述问题比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法治不够健全，但人们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和价值观的影响面前，不断增强的欲望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的可能性。在一些中东、非洲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激烈的形式表达，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胁；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又往往转变为超越法治的强权，压制了个人自由、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维持这一动态平衡的砝码，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抑或政教合一体制的回归（例如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伊朗），都未能为社会公正提供完整的答案。

经验证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

第四，在国家同社会、政府同市场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但尚未产生能真正与之抗衡的革命性力量。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曾被认为代表着普世价值；但过去十多年来，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迷信遭到普遍怀疑和否定。但是，如何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寻找一种合适的

在国家同社会、政府同市场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但尚未产生能真正与之抗衡的革命性力量。

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在很多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在急剧扩大。环境恶化、生态失衡、金融动荡、社会分裂，都呼唤政府发挥克制贪欲、维护公正的社会平衡器作用。但是，如果政府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过程不透明，其权力越大，社会失衡就越严重。“第三条道路”难以找到实质的精神内涵与政策支撑，原因即在于此。20世纪初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思想，以终结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远大目标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在21世纪初如同空谷足音。以推翻邪恶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为表面目标的零星暴力活动，被贴上“恐怖主义”标签，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所谓“反全球化运动”，亦只能由缺乏坚实思想后盾、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乌合之众所推动。针对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目前受制于政府间静悄悄的合作、竞争与交易，而不能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第五，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正在超越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民国家的界限，成为纠正全球社会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和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和平、环境、人权等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分量，成为每一个国家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之同步的，是国家之外的新的社会认同，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出于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以国家为名的赤裸裸的思想专制，而是软性的、国家以外的社会认同。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和公民效忠对象，但仔细考察世界政治史和思想史便不难发现，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例如在若干中东和非洲国家，相当多的民众对自己的家族、族群和教派的认同，超过了对传统主权国家的认同，于是发生了苏丹的一分为二，而利比亚等国也存在分裂的危险。

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正在超越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民国家的界限，成为纠正全球社会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和动力。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这个时间段内，世界历史似乎已经实现了一次螺旋式的上升。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多姿多彩，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为不确定。世界正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就是一个例子。面对海啸、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面对越来越凸显的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国家如何实现善治？世界如何实现共治？人类如何应对共同挑战？最近30多年的历史还说明，苏联模式固然已成为不会再重演的历史，而今日西方也无法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提供现成的模式和答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点燃了新的希望，但一切皆在探索阶段，其普世意义尚待历史考验。在这一意义上，旧的历史确实已经终结，新的世界历史也许才刚刚开始。

二、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一直在“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经历着似乎不断加速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中国不断地拷问自身的“国际定位”或“国家身份”。在上述世界政治的宏大背景下，如何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认清“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我们思考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前提。

第一，从国家实力层面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是否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进而在世界上实力仅次于美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同日本相比，中国不但人口众多、领土广阔、经济规模宏大，而且国防力量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它，又掌握了核武器。可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地缘战略优势和地缘经济优势都已超过日本。因此，说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应是可以普遍接受的观点。这里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于日本的综合“硬实力”虽然逊于中国，但它是同美国结盟的发达国家，并以此弥补了它在地缘战略中的劣势。在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等方面，日本远高于中国，在亚洲的文化软实力也不弱于中国。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日本民族凝聚力甚强，政治体制坚固，社会长期稳定，生态环境优良，即使在过去20年经济持续低迷、政府频繁更迭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政治动荡，在前所未有的地震海啸冲击下也没有惊慌失措。日本的“稳”与中国的“快”、日本的“质”与中国的“量”，形成了鲜明对照，互有所长。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轻视日本的实力地位，将会犯重大错误。

同样不能轻视的还有欧洲。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任何单个的欧洲大国，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规模同美国不相上下，欧元已是堪与美元相竞争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同欧盟的差距还很大。因此，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经济虽已是世界第二，且发展势头良好，但仅据此认为中国实力已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二，过一二十年即可与美国平起平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特别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滞后，在国际舆论中声音仍较微弱，远远谈不上“世界第二”。对于中国的全球实力定位，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不过，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和俄罗斯，在实力方面也各有千秋。

中国经济虽已是世界第二，且发展势头良好，但仅据此认为中国实力已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二，过一二十年即可与美国平起平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二，从地缘战略角度看，中国地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亚洲（即不包括西亚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所谓“远东”）的中心位置，随着同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中心，在本地区经济发

展中的“领头羊”作用超过美国和日本。中国也参加了东亚地区的几乎所有区域性经济组织，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不过，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却是另一番处境。中国没有同周边任何国家结成政治或军事同盟，却与日本、印度、越南等邻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领土或领海纠纷。美国主导的“轴辐同盟体系”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格局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这些军事安排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种情况，使中国无法像德国、法国或巴西那样，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代表本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言。换言之，中国有对亚洲的地理认同，也逐渐有了经济认同，但却难以建立政治认同，无法作为亚洲的“领导者”或“代言人”的面目出现。虽然一些中国人热衷于谈论“东方文化”或“亚洲文明”，但中华文明（更确切地说是汉文明）同印度文明、波斯文明、日本文明等同属亚洲的文化体系，除了都有别于欧美文明以外，相互之间却是千差万别。因此，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国家之一，而不是超乎其他大国之上的“领导者”。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固然正迅速向全球扩展，但无论从任何方面看，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都难以同美国这个唯一的全球大国平起平坐。

中国有对亚洲的地理认同，也逐渐有了经济认同，但却难以建立政治认同，无法作为亚洲的“领导者”或“代言人”的面目出现。

第三，从国家政体属性看，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独特，加之处于深刻而长远的改革进程中，其前进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中国尚未完全实现领土统一，面临民族分裂威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和谐因素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非常缓慢。在国家财力充足、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人均收入低，贫富悬殊大。在政治体制稳固的同时，制度创新能力较弱，社会凝聚力有待增强。在主流意识形态鲜明、宣传工作主旋律突出的同时，社会思潮和舆论日益多元化，政府部门需时刻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政治渗透。出于国内国际方面的种种考虑，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民主化变革和国家分裂采取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上述特殊国情与国策，说明中国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仍然十分巨大，而且看不到缩小的趋势，中国也因此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异类”。

第四，所谓的中国“国际定位”，其实主要指角色定位，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而角色定位又受制于上述三方面定位（即实力定位、地缘战略定位和国家政体属性定位）。例如，中国的实力定位决定了中国不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出于自身利益和力量对比的考虑，中国接受了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国际规则，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日益增长的实力使中国得以在国际组织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也承担了更多的外援、维和等国际责任。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周边国家所投入的政